

“发展中的邓小平理论”丛书

发展在中国 理论与实践

主编●夏禹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展在中国

理论与实践

主 编

夏禹龙

作者

夏禹龙 诸大建 陈 维

黄凯锋 王冷一 祝如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夏禹龙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1

(发展中的邓小平理论)

ISBN 7-80618-709-X

I. 发... II. 夏... III. ①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②经济发展-研究-中国③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445 号

发展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主 编:夏禹龙

责任编辑:柯 言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7

插 页:2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 1—3 000

ISBN 7-80618-709-X/F · 440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否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自然也是如此。研究邓小平理论,一定要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邓小平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在充满着剧烈和深刻的变动的时代。邓小平逝世后短短几年,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威胁继续严重存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仍在发展,但它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进展迅速,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11/16/03

然趋势。由于这一过程为发达国家所主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提上世界事务的重要议事日程。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信息的网络化日益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面貌,不仅使各国经济而且使它们的政治和文化都面临如何有效应对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使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

从 21 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调整。由于中国的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经过 20 年的推进,今后改革的任务将更艰巨,利益调整的幅度和难度将更大。

同时,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已从短缺阶段进入相对过剩阶段。扩大国内需求已成为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实现 21 世纪长远发展的方针。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的调整。要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加快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国

际分工之中。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制订和实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一系列对策。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的创造性的实践,为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这几年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邓小平理论正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着,明显地表现在党的十五大所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明显地表现在“三个代表”的党建理论上。因此,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要向更高的水平提升,不应停留在对邓小平理论体系或者对邓小平理论某一方面观点的综述和诠释上(当然这仍然是需要的),而应更多地关注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对它的丰富、发展。基于此,我们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发展中的邓小平理论”丛书,陆续出版问世,以期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裨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2000年8月

目 录

1	导言	(1)
1.1	发展和发展理论概念的界定	(1)
1.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线索	(2)
1.3	近代中国的发展理论线索	(4)
1.4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理论线索	(10)
1.5	发展的时代意义	(16)
2	邓小平对世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19)
2.1	邓小平正确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	(19)
2.2	邓小平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	(29)
2.3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特色	(37)
2.4	国际社会对邓小平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评价 ...	(66)
3	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发展成就和问题	(81)
3.1	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81)
3.2	社会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108)
3.3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就和问题	(126)
4	21 世纪初中国发展的展望	(145)
4.1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综合国力	

显著提高	(145)
4.2 促进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中心的社会全面 发展	(175)
4.3 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85)
 主要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15)

导 言

1.1 发展和发展理论概念的界定

在发展理论中,“发展”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的 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就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教育。狭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或转化。这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迫切需要解决选择何种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而首先由一批欧美国家的学者创立起来的。本书对于“发展”一词是从狭义上使用的,可以将发展简略地定义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展。

由于发展问题在中国是头等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称作“中国的发展路线”。围绕着发展问题,可以把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途径、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发展速度等命题基本上包容进去。内容的过于广泛,会影响理论阐发的深入。因此,本书的

内容以阐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本身的基本观点为重点,而对于与发展相关的其他问题只作简要的阐述。从发展本身的内涵来看,可以分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发展四个方面。本书将重点讨论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在理论认识上的依次递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线索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1894年有一位叫卡内帕的意大利友人写信给恩格斯,请他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段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可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同于它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是靠道德说教所能实现的,它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为其物质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恩格斯关于人类与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义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论”错误地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征服自然，结果却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即生态环境。他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①。他特别向人们提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这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列举了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到今天，这种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列宁是在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 现实条件下考虑发展问题的。显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当时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仍必须朝着这一目标一步步逼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③。与此同时，列宁在发展问题上，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他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④

毛泽东是在比俄国十月革命时更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现实条件下考虑发展问题的。他理所当然地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早在建国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就明确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 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更把中国经济建设能否搞上去,提到是否会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高度。可惜,从50年代后期起,随着“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发展思想也陷入迷误。

1.3 近代中国的发展理论线索

近代中国的历史,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抵御列强侵略和变革旧政权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但是,除了各种政治改良和革命的理论以外,也有其他一些发展理论,它们中的多数在当时虽不免坠入空想而不切实际,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可以借鉴和参考的东西。在本节中,将对这些发展理论择其要者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并进行一定的梳理。

一、以商富国——洋务思想家的发展基本理念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封建统治者甚至认为对外通商是对外夷的恩赐。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指出:纵观直到近代为止的东西方贸易历史,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持续而典型的流向欧洲市场的商品是茶叶和生丝,而流回到亚洲市场的最典型的货币则是白银。但是,西欧等国的重金主义者对白银的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6页。

出持批评态度,并寻求一种不用银结算而能获茶叶的贸易方式。首先,他们尝试用本国的工业产品作为等价物而未获成功。之后,则试图以印度鸦片为媒介,通过英、美、中的三角贸易关系把中国卷入国际市场。但是,这种贸易关系的走私色彩非常浓重,而且交易品种和区域也非常狭窄,不能满足国际市场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是迟早要改变的。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对象,对外通商已成定局,欲拒之而不能。当时放眼世界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并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发展对外贸易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因同情太平天国而遭清廷通缉、遁居香港的王韬认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靠通商富国的。曾在欧洲游学多年的马建忠在其《富民说》中也用进出口差额来解释通商致富论,他说英、美、法、俄、德、印度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郑观应、汪康年以及曾国藩等人,还把对外商业竞争称之为“商战”,而商人是商战的主角,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便中国在对外商业竞争中能取得胜利。重商思想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主要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重商思想家们认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财富,主要来自于流通领域,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却反映了近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特点。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洋务派领导人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采纳,并付诸实施,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早期改良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政策性线索。

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理论

孙中山首创革命救国,同时又系统地提出以发展实业来推

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张。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不无兴奋地说:“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并强调:“中国人民号称四百兆,物产丰盛甲于全球,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当首利用,以振兴其工商业。”他还号召华侨同胞为了国家之富强,回国投资,认为这“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我国民之责任”。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的一段时期,孙中山将倡导实业建设、利用外资、鼓励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视为当务之急。孙中山除了在上海闭门立说期间完成了他的巨著《实业计划》外,还在各地演说中积极地宣扬他利用外资兴办实业的思想。他还阐明了利用外资兴办实业的三种形式:一是“借款修路”,“以公司营业性质,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借款”;二是“招股章程,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准外人入股”,“与外人合办”企业;三是“批给外人修筑”,“批归外人承办”。孙中山本人更倾向于第三种形式,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人才和管理方法。朱执信、廖仲恺、黄兴等同时代的革命家也赞同孙中山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未及实施,他们就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三、北洋时期的实业振兴政策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为时不长,但大力提倡“开放门户”、“利用外资”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需求,全国范围内也确实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尽管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极其反动,但在经济上并不排斥“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方针”。袁世凯还将一些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拉入政府,征求和采纳了他们实行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不少建议,制定了一些开放式的振兴实业政策和法令。北洋政权先后颁布了《公司案例》、《商人通例》、《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

则》等,以鼓励创办公司,扶植工商业;制定了《矿业条例》、《矿业条例实施细则》、《矿业注册条例》和《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等,以鼓励发展采矿事业,奖励垦荒以及棉、糖等副业生产等;拟订《农工银行条例》、《劝业银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法》等,以疏通金融,改革币制等等。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军阀间的混战,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但它们并没有随着袁世凯个人势力的垮台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并与以后的提倡国货运动相融合,也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论

乡村建设派,是一个以农村建设为社会改良的基础与核心的政治派别。20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与崩溃的过程大大加剧了。由于农村购买力的降低,帝国主义无法推销它的商品,地主收租也发生了困难,国内外的许多政治力量,都把眼光集中于中国的农村,帝国主义者叫嚷着要救济中国农村,国民党政权为巩固自己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在行政院设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高唱农村复兴的调子。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医治日益凋敝的农村,是解决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所在。一时间,打着复兴农村的旗号,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者,时人都称之为乡村建设派。其代表人物是在山东邹平、菏泽搞实验县的梁漱溟。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中国不需要任何变革,只要到乡间去从事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核心的工作,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具体做法有:一是建立“乡农学校”,校长、校董由当地豪绅担任;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吸收地方知识分子参加;三是建立

“合作社”，以增加农民的互助联系。总的目标是把农民的文化学习组织和政权机构合一，以实现乡村政、教、兵、财的一体化。在梁漱溟看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容纳了政治、法律与国家在内的民众教育，一旦农民普遍接受了它的内在理性，包括政治在内的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他是以文化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希望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结构是“中国精神+西洋长处”，其具体公式为“理性+民主与科学”。由于梁漱溟不承认当时中国农村中严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因此他自负地认为，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要比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高明得多，甚至可以替代共产党。这种主张后来遭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他所实验的“乡农学校”和乡村自卫组织也分别成为土豪劣绅进一步控制农民的“自治机构”和地主武装，至于合作社则不了了之。

五、以教育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

平民教育是“五四”民主精神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一些知识分子推行平民教育，大多受杜威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企图以教育为救国、兴国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实现平民政治和社会改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曾在北京参与组织中华贫民教育促进总会（1923年）并任总干事的晏阳初（1890—1990年）。晏阳初认为，“愚、穷、弱、私”“是中国目前的大患”，是中国人生活上的四种基本缺点，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其根源是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提倡用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复兴中国。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宣称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造人，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那么中

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在 30 年代初期晏阳初还选择河北设立了“县政建设研究院”，并组织农民成立“公民服务团”，大力宣扬扫盲、卫生，改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式和改良家畜，试验新法制造火腿及熏肉等。这类活动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流产。

六、苏区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 30 年代除了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理论外，还在自己所建立的政权范围内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既批评了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的观点，又批评了“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①当时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前提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实行耕种互助。苏区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还有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程度更高的农业合作组织——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组织对发展落后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工业方面，为了适应群众生活的需要，苏区也建设了一些民用品工厂。以中央苏区为例，民用工厂就包括制糖、制盐、纺织、煤炭、炼铁、造船、农具以及纸张、烟草、樟脑、肥料、医药等行业。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还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加强对输出入商品的管理，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1934 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出入口公司——中华商业公司，同福州、厦门和

^①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05、109 页。